故宫博物院藏传佛教学术研究史
(1925～2015)

The Palace Museum: An Academic Research History of Tibetan Buddhism (1925~2015)

马骥越

Ma Jiyue

故宫博物院 The Palace Museum
Journal of Gugong Studies 2015Vol.15
故宫学刊
二〇一五年 总第十五辑
故宫出版社 |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故宫博物院藏传佛教学术研究史（1925～2015）

The Palace Museum: An Academic Research History of Tibetan Buddhism (1925~2015)

马骥越

Ma Jiyue

内容提要：

藏传佛教研究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近年来呈蓬勃发展之势。故宫博物院拥有独特的藏传佛教研究资源，文物数量及质量都为上乘，且有鲜明的宫廷特征，为研究藏传佛教在明清两代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对研究明清藏传佛教文化艺术、历史、佛堂及制度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故宫博物院藏品的基础，本文以故宫博物院藏传佛教研究人员的研究历程为基本脉络，收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表和出版的论文、专著、图录等，按照藏传佛教艺术、经典、佛堂建筑及明清藏传佛教史几方面分类总结归纳了研究成果，对故宫博物院的藏传佛教研究成果作了基本整理。

关键词：

故宫　藏传佛教　研究　成果

ABSTRACT:

Research on Tibetan Buddhism has drawn growing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from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The Palace Museum possesses unique resources for research on Tibetan Buddhism, including an abundance of high-quality objects in its collection, which, as physical materials for research into the Tibetan Buddhism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research into Tibetan Buddhist culture, art, history, monasteries and systems. On the basis of the Palace Museum's collections, this paper traces the course of Tibetan Buddhist researches by Palace Museum researchers, and makes summaries – under the categories of Tibetan Buddhist art, classics, temple architecture, and the history of Tibetan Buddhism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 of the theses, monographs, and museum catalogs published since the 1980s regarding Tibetan Buddhism.

KEYWORDS:

Forbidden City, Tibetan Buddhism, research, achievements

一　故宫博物院藏传佛教研究资源概述

藏传佛教是大乘佛教两大宗派之一，公元 7 世纪，佛教分别从汉地、印度、尼泊尔传入西藏，继承了印度的密宗传统，与本土宗教苯教相互斗争、相互影响，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是藏族文明的精粹。随着藏学研究的发展深入，藏传佛教研究亦取得了突出成果。故宫收藏的藏传佛教文物，无论在数量、品质、类别方面均居全国各大博物馆之前列。作为明清两代皇宫，故宫现今仍保存着完整的清宫藏传佛教佛堂，故宫研究人员在丰富的文物和文献资源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研究，尤其在宫廷藏传佛教艺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故宫博物院藏传佛教资源丰富，有如下特点。

（一）文物数量众多，风格类型多样

故宫博物院收藏藏传佛教相关文物众多，提供了丰富了研究资源。主要分为造像、唐卡、法器、佛经、档案五类。原状佛堂文物约 2 万件，文物库房中收藏的铜造像有 8600 余件，法器 7000 余件，主要为清宫旧藏。造像材质多样，铜造像为主，有少量泥质、瓷质、玉石质、铁质、金银质造像。所藏造像年代自 7 世纪至 20 世纪初均有涉及。产地包括今天环喜马拉雅大部分地区、蒙古地区、北京及周边为代表的汉地藏传佛教区。宫廷造像以明清宫廷造像为主，在数量和质量上为国内收藏之前列。造像之外，亦收藏有大量唐卡，唐卡年代大部分为清代乾隆时期，清宫唐卡以乾隆时期最为丰富，也最有特色，在对西藏唐卡的模仿和题材的承袭基础上进行了独创，精美华丽、仪轨严谨、图像准确。法器同样以西藏进贡和宫廷制作为主，种类繁多，与佛堂相配套，系统完整、精美华贵。主要有七珍、八宝、五供、铃杵、嘎布拉鼓、嘎布拉碗、胫骨号、奔巴瓶、曼扎、海螺、舍利等。此外，清代宫廷中抄写和刊印的佛经数量惊人，康熙八年以明代宫廷抄写的藏文《大藏经》为底本，抄写了《龙藏经》一部 108 函，乾隆在此基础上，反复抄写了四部。现仅存一部，除其中 12 函保存在台北故宫外，其余 96 函均保存于故宫图书馆。经书抄写装潢之精良，世所罕见，亦有多民族语言对照的文献，佛教经典如《大乘首楞严经》《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白伞盖仪轨经》（六世班禅奉乾隆御旨编纂）、《御制大云轮请雨经》《御制大悲心忏法仪轨经》《五译合璧集要》等均为满蒙汉藏四体对照本，流传颇广。现图书馆收藏的非汉语佛经 28280 册，其中藏文佛经 369 部，蒙文佛经 265 部，满文（包括多语言合璧）佛经 25 部。还有一些非佛教文献也值得重视，如明成祖的御制文集，清代皇帝的御制诗文集以及清代从顺治到光绪朝删定的《理藩院则例》都包含了大量有关西藏的文献[1]。

（二）文物来源清晰，有明确档案资料

故宫的文物来源主要为外来进贡及清宫制造，有一大部分有明确的文字记载，为文物研究提供了坚实有利的依据和丰富的实物资源。文献记载和实物证实，元明清三朝宫廷中均有铸塑佛教造像的活动，尤其是清代宫廷造像数量庞大。乾隆初年，三世章嘉若必多吉奉旨对清宫所藏的佛教造像进行清理和分类，并以满汉

1　相关数据参考罗文华：《故宫博物院所藏藏传佛教文物概述》，《中国藏学》2010 年。

文书写黄条（即黄色纸条），说明造像的质地、尊名、年代、进贡者。此后宫中收藏的所有造像均系有这种黄条，成为宫藏佛教造像的特色之一。根据这些黄条，我们可以确认造像的来源。另一独特资源为图书档案，主要为紫禁城各宫殿陈设档，其中包括各佛堂陈设档，大多数收藏于故宫图书馆，少量收藏于宫廷部和书画部[1]。

（三）有独特的原状宫廷佛教建筑

在故宫庄严华丽的宫殿之中，有些与藏传佛教紧密相关，为明清皇家进行藏传佛教佛事活动的场所，以清朝最为盛行。以中正殿、宁寿宫和慈宁宫等区域为主。这些宗教建筑留存至今，并留下了大量相应的文物及史料，为研究清代宫廷藏传佛教发展，以及清宫与蒙藏地区的历史关系提供了丰富的资源。现存建筑及文物完整地展现了清代历史空间原貌，是极其珍贵的文化遗存，反映了清朝皇室对藏传佛教的信仰。故宫现存基本完整的佛堂有 10 处，如西路的养心殿西暖阁内佛堂，中正殿一区的雨华阁、梵宗楼、宝华殿，慈宁花园一区的咸若馆、吉云楼、临溪亭，宁寿宫一区的养性殿西暖阁内佛堂、佛日楼、梵华楼。这些佛堂基本上保持了清乾隆时期的内部陈设原始状态，对于我们探讨清宫藏传佛教的历史原貌有重要的价值。

故宫博物院建院以来，故宫对藏传佛教的研究几乎为空白，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故宫的藏传佛教研究开始起步，至今二十余年，成果颇丰。近二十年来，故宫藏传佛教研究以原状陈设及藏品为基础，结合学术界藏学研究重点，重点集中于对宫廷藏传佛教建筑及文物资源的整理研究，对清宫藏传佛教艺术及历史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将继续深入细化。可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 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的探索期，第二阶段为进入 21 世纪以来的发展期，以下按照研究的时间路径对研究成果做一梳理。

二　研究探索初期学术成果 (20 世纪 80 年代～21 世纪初)

研究开展初期，面对大量的文物资源，对其进行分类整理，进行针对性的研究是重点和难点。研究之初，在探索整理文物资源基础上，在藏传佛教艺术方面，结合馆藏资源，研究成果集中于对藏传佛教尊神的研究及造像风格的论述，在清宫藏传佛教文化方面，包括对宫廷藏传佛教建筑、清宫藏传佛教历史的探讨。

（一）藏传佛教艺术研究

藏传佛教汇聚了佛教的显宗、密宗和藏地苯教等内容，具有鲜明的地方和民族特色。其信奉神系庞杂，既有佛菩萨信仰，亦包括罗汉、上师及诸多护法神。故宫所藏造像资源丰富，题材多样。研究初期，故宫研究人员对文物资源进行了研究整理，丰富了对藏传佛教神系的认识了解，将故宫藏品公布于众，增强了对西藏文化的传播，推动了西藏艺术研究的发展。研究藏传佛教尊神及神系的学术论文有《三世佛像》[2]，《藏传佛

1　相关数据参考罗文华：《故宫博物院所藏藏传佛教文物概述》，《中国藏学》2010 年。

2　罗文华：《三世佛像》，《紫禁城》1993 年第 1 期。

教中的猪神——金刚亥母》[1]《藏传佛教中的马头金刚》[2],《藏传佛教中的死神及其终结者》[3]《嘛哈噶喇神与皇家信仰》[4]《天母像》[5]《历史上的“欢喜佛”与双身修行》[6]等。这些尊神不只以造像形式出现，也以唐卡绘画的形式出现。《清宫藏达赖、班禅唐卡中的姊妹护法》[7]一文详细解析了唐卡中的姊妹护法。藏传佛教供奉体系庞杂，祖师像在造像中也较为常见。《卫拉特蒙古高僧咱雅班第达铜像考——兼述咱第达生平》[8]在《咱雅班第达传》基础上，分析了蒙古高僧咱雅班第达铜像成造的缘起，推造了其铸造时间。咱雅班第达在维护民族团结、发展民族文化等方面贡献颇巨，迄今在新疆地区的蒙古族人们的心中仍占有很高的地位，此造像的发现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卫拉特蒙古族人民中意义都非常重大。



图 1　铜鎏金嵌珠宝四臂观音

造像风格研究是藏传佛教艺术研究之重点，故宫大量的造像资源极为难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尊黄铜镀金嵌珠石的四臂观音〔图 1〕,《一尊康熙朝四臂观音造像》[9]一文以此为研究对象，对其形象及造像缘由进行了讨论，得出结论：此造像意义特殊，是康熙帝为其祖母太宗孝庄文皇后铸造，体现了康熙皇帝的孝亲思想，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及艺术价值。《清宫藏铜佛》[10]重点介绍了故宫几尊珍藏文物,将宫廷造像带入了大众视线。《清宫金铜佛造像风格》[11]结合馆藏资源对清宫金铜佛造像风格进一步作了整体论述,西藏艺术对尼泊尔、印度造像艺术进行了模仿，形成了成熟的艺术风格，并对内地宫廷产生了重大影响。《明代梵式佛造像》[12]对故宫收藏之明代宫廷造像做了初步探索。此外，出版有专著《藏传佛教金铜佛像图典》[13]，收录藏传佛教金铜佛像计378尊,全书依佛像地域风格分为外国风格、西藏本地风格、内地风格三部分,每部分之内按时代先后排列。《清宫藏传佛教文物》[14]收录了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唐卡、造像、佛经、法器，以及清宫佛堂，对于社会大众及学术界了解故宫藏品资源具有重要意义。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斯瓦特风格的铜佛像共有14尊,年代在7～10世纪间，

1　罗文华：《藏传佛教中的猪神——金刚亥母》，《紫禁城》1995 年第 3 期。
2　罗文华：《藏传佛教中的马头金刚》，《紫禁城》1997 年第 1 期。
3　罗文华：《藏传佛教中的死神及其终结者》，《紫禁城》1997 年第 4 期。
4　王家鹏：《嘛哈噶喇神与皇家信仰》，《紫禁城》1996 年第 1 期。
5　李中路：《天母像》，《紫禁城》1997 年第 1 期。
6　罗文华：《历史上的“欢喜佛”与双身修行》，《紫禁城》1999 年第 1 期。
7　王子林：《清宫藏达赖、班禅唐卡中的姊妹护法》，《紫禁城》1998 年第 4 期。
8　罗文华：《卫拉特蒙古高僧咱雅班第达铜像考——兼述咱雅班第达生平》，《故宫博物院院刊》1997 年第 1 期。
9　王躍工：《一尊康熙朝四臂观音造像 》，《紫禁城》1993 年第 1 期。
10　王家鹏：《清宫藏铜佛》，《收藏家》1994 年第 3 期。
11　罗文华：《清宫金铜佛造像风格》，《清代宫史丛谈》1996 年第 10 期。
12　罗文华：《明代梵式佛造像》，《收藏家》1997 年第 1 期。
13　王家鹏：《藏传佛教金铜佛像图典》，文物出版社，1996 年。
14　故宫博物院编：《清宫藏传佛教文物》，紫禁城出版社，1998 年。

几乎贯穿斯瓦特风格之始终。《故宫博物院藏古印度斯瓦特铜佛像研究——兼论斯瓦特风格的形成》[1]一文作了详细论述。文中提出，可以将 6 ～ 10 世纪的斯瓦特风格分作两个时期:6 ～ 8 世纪为前期，是形成与初步发展的阶段，9 ～ 10 世纪为后期，是鼎盛并转衰的阶段。故宫所藏 14 件斯瓦特风格藏品，前、后期刚好各占一半，而且基本上展现了两个时期佛教造像艺术的主要特点。文章发表之时还没有见到国内其他博物馆有关斯瓦特风格藏品的研究成果，且斯瓦特风格造像在世界范围内数量也极少，而故宫一处就存有 14 件之多，相对而言数量惊人，其中带满汉文黄条的共有 7 尊，根据黄条内容推测进贡时期全部是在乾隆朝，这批佛像的公布对斯瓦特艺术风格的进一步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古代喀什米尔地区亦是重要的佛教艺术中心，《喀什米尔风格佛像之鉴定》[2]《故宫藏喀什米尔风格铜造像研究》[3]在论述喀什米尔政教发展史的基础上，以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喀什米尔风格佛像为例，论述了喀什米尔造像艺术风格的演变。故宫的喀什米尔造像作品主要由西藏贵族或高僧进贡，且具有年代连续性，为其他博物馆藏品所少见，同时，清宫对喀什米尔造像风格的仿效为独有。《西藏古格那嘎拉咱王及其铜像分析》[4]一文，论及了四尊有“那嘎拉咱”款的佛造像，皆有喀什米尔风格，文章就这几尊佛像的断代和产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其中一尊为故宫收藏。故宫所藏铜佛造像中，有一世哲布尊丹巴时期的铜佛像 7 尊，这一时期造像有明显尼泊尔风格，《故宫藏蒙古铜佛造像研究——试论一世哲布尊丹巴时期佛造像艺术风格的来源》[5]一文在对这些佛像进行对比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物与一世哲布尊丹巴的传记资料，讨论了此种艺术风格的来源。此时期的研究由对个体造像的研究转向了整体风格的归类、对比研究，更为系统化。

除了以佛造像为主要研究对象，关于法器亦有研究论述。涉及佛塔的论述有《梵华楼珐琅塔和珐琅塔则例》[6]《清宫妙法莲华经塔与观音崇拜》[7]，涉及密宗法器的论述有《藏传佛教祭法器——嘎巴拉碗》[8]。

乾隆第二次南巡杭州时，见唐末僧人贯休所绘十六罗汉像，极为欣赏，为之题赞题跋，回宫后命工匠以此为底本制作了十六罗汉屏风一组。《乾隆御赞十六罗汉屏风》[9]对此进行了详细介绍。十六罗汉形态各异，每尊罗汉名号旁都加有“乾隆宝翰”“得而自在”等印，第十六屏还嵌有乾隆题跋，可见乾隆之喜爱。

故宫藏传佛教研究不只将目光局限于故宫资源上，兼及对藏传佛教艺术其他研究重点的关注。《元代杭州佛教密宗造像之研究》[10]一文对杭州飞来峰密宗造像进行了研究论述，补充了当时美术史研究在密宗造像方面的不足。

---

1 罗文华：《故宫博物院藏古印度斯瓦特铜佛像研究——兼论斯瓦特风格的形成》，《故宫博物院院刊》1997 年第 3 期。

2 罗文华：《喀什米尔风格佛像之鉴定》，《收藏家》1999 年第 3 期。

3 罗文华：《故宫藏喀什米尔风格铜造像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 年第 5 期。

4 罗文华：《西藏古格那嘎拉咱王及其铜像分析》，《故宫学术季刊》1998 年第 16 期。

5 罗文华：《故宫藏蒙古铜佛造像研究——试论一世哲布尊丹巴时期佛造像艺术风格的来源》，《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 年第 2 期。

6 王世襄：《 梵华楼珐琅塔和珐琅塔则例》，《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 年第 4 期。

7 罗文华：《清宫妙法莲华经塔与观音崇拜》，《紫禁城》1996 年第 4 期。

8 罗文华：《藏传佛教祭法器——嘎巴拉碗》，《紫禁城》1996 年第 2 期。

9 李中路：《乾隆御赞十六羅汉屏风》，《紫禁城》1990 年第 2 期。

10 王跃工：《元代杭州佛教密宗造像之研究》，《新美术》1998 年第 2 期。

（二）藏传佛教经典研究

清代官刻的汉文《大藏经》亦称“清藏”，因其经页边栏饰以龙纹，又称“龙藏”。《清〈龙藏经〉的刊刷情况拾遗》[1]一文对其刊刷情况作了论述。清《龙藏经》始刻于雍正十三年，完成于乾隆三年，是我国历代官刻大藏经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全藏共收经、律、论、杂著等一千六百七十种，七千二百四十卷，共用经板七万九千零三十六块。乾隆中期，因文字狱而奉旨从中撤出五种，七十二卷，因此全部《龙藏经》实际上为一千六百六十五种，七千一百六十八卷，经板七万八千二百三十块。该藏是在明刻《北藏》的基础上编校而成，较之《北藏》略有增减，增加了明清以来著名高僧的语录、杂著和论疏，使其更具特色。本文考察了《龙藏》经板的采买，校阅、刊刻《龙藏经》的组织情况及印刷部数。

藏文《大藏经》自古以来就有写本、刻本两大体系，14 世纪以前为古写本时期，之后是刻本时期。《康熙朱印藏文甘珠尔谈略》[2]一文对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收藏的一部康熙三十九年朱印藏文《甘珠尔》进行了详细论述，现存最早的刻本藏文《甘珠尔经》是明永乐八年（1410 年）永乐皇帝在南京刊刻的，底本是蔡巴《甘珠尔》古写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康熙三十九年朱印藏文《甘珠尔》（北京版）极其珍贵，是永乐版之后的第二版官版大藏，是康熙皇帝为其母亲和祖母祈福而刊刻的，无论是技术力量还是资金都非常雄厚，刊刻过程历时 17 年，为长条散叶，梵夹装，共一百零六卷。由皇帝亲自颁赐御制序文，以夏鲁寺古写本为底本，是清前期雕版印刷史上的一次盛举，也是保存传播珍贵的佛教典籍的有力措施。

（三）宫廷藏传佛教佛堂研究

宫廷藏传佛教佛堂建筑是重要的研究资源，故宫佛堂众多，大部分至今保存完好。包括中正殿区域的雨华阁、梵宗楼、宝华殿，慈宁花园区域的咸若馆、吉云楼、临溪亭，宁寿宫区域的养性殿西暖阁内佛堂、梵华楼，以及单独的养心殿西暖阁内佛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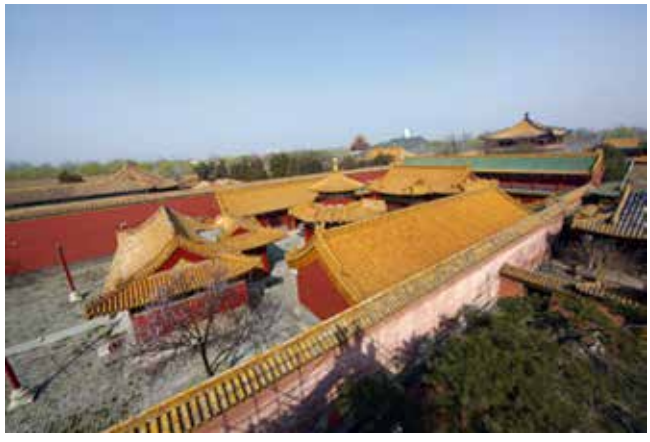


图 2　中正殿全景

中正殿〔图 2〕位于紫禁城西北的建福宫花园南侧，是清宫中正殿佛堂区的统称，清代档案中常把以中正殿为中心的 10 处佛堂建筑总称为“中正殿”，包括中正殿、淡远楼、中正殿东西配殿、香云亭、宝华殿、雨花阁、雨花阁东西配殿、梵宗楼等 10 座藏传佛教建筑，是清代宫廷藏传佛教活动的中心区域。康熙三十六年(1697 年)，清宫在中正殿设立了专门管理宫中藏传佛教事务的机构——中正殿念经处，并每年定期在中正殿区域举行多种佛事活动。《中正殿与清宫藏传佛教》[3]一文探讨了藏传佛教在宫廷的情况，

1　（清）杨玉良：《〈龙藏经〉的刊刷情况拾遗》，《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 年第 4 期。

2　李国强：《康熙朱印藏文〈甘珠尔〉谈略》，《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 年第 4 期。

3　王家鹏：《中正殿与清宫藏传佛教》，《故宫博物院院刊》1991 年第 3 期。



图 3　雨花阁外景



图 4　梵华楼外景

论述了西藏佛教文化在清宫的影响。

雨花阁〔图 3〕位于内廷外西路春华门内，是宫中数十座佛堂中最大的一处。为清乾隆十四年（1749 年），乾隆皇帝采纳蒙古三世章嘉国师胡土克图的建议，仿照西藏阿里古格的托林寺坛城殿，在原有明代建筑的基础上改建而成，是一座密宗佛堂。《雨花阁》[1] 一文结合史料对雨花阁建筑做了论述。《八国联军抢劫雨花阁》[2]《故宫雨花阁探源》[3] 探讨了其建筑沿革、建筑形式、内部陈设与佛像思想的关系，以及清朝皇帝与这座佛殿的关系。《雨花阁与桑耶寺比较研究》[4] 一文，从桑耶寺与雨花阁的比较中，指出雨花阁在建筑风格、室内装修上的不同之处。《故宫雨华阁藏密神系与密宗四部思想研究》[5] 进一步讨论了雨花阁藏密神系与密宗四部思想。

梵华楼〔图 4〕位于宁寿宫区最北端，建于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按照藏传佛教显宗、密宗四部供设佛像、唐卡、供器，将显、密两宗集于一体，体现出格鲁派显密双修的修行特色。楼中所供佛像全面系统地塑造出藏传佛教中诸佛菩萨及护法的各种形象，是研究藏传佛教造像的珍贵材料。梵华楼的建筑、陈设形式是清宫廷佛堂的一种重要模式，清宫档案中称之为“六品佛楼”。《故宫六品佛楼梵华楼考——清代宫廷佛堂典型模式》[6] 一文，从建筑与文物两方面依据文献档案对梵华楼及其他几座六品佛楼作了简要考察，包括建筑格局与内部陈设，以及六品佛楼模式运用。《梵华楼护法神唐卡辨析》[7] 一文考证了梵华楼楼下供奉的六部护法神唐卡像 54 尊护法神的形象特征、位置及其排列组合关系，说明了梵华楼护法神像的配置严格遵循了西藏佛教的传统与教义，主次分明，排列有序，完整严密，是 18 世纪藏传佛教在内地的重要文化遗存。梵华楼唐卡纪年准确，形象鲜明，对于藏传佛教图像学研究、艺术史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　许以林：《雨花阁》，《紫禁城》1989 年第 6 期。

2　王家鹏：《八国联军抢劫雨花阁》，《紫禁城》1989 年第 1 期。

3　王家鹏：《故宫雨花阁探源》，《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 年第 1 期。

4　刘盛：《雨花阁与桑耶寺比较研究》，中国紫禁城学会，1997 年。

5　罗文华：《故宫雨华阁神系与密宗四部研究》，《佛学研究》1997 年。

6　王家鹏：《故宫六品佛楼梵华楼考——清代宫廷佛堂典型模式》，载于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编：《第二届国际满学研讨会论文集》（上），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1999 年第 23 期。

7　王家鹏：《梵华楼护法神唐卡辨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 年第 6 期。

（四）明清宫廷藏传佛教历史研究

在文物藏品研究基础上，这一时期同样注重对清宫藏传佛教历史文化的研究考察。《清宫藏有关“金瓶掣签”文物》[1]一文结合历史档案、收藏文物对金瓶掣签制度作了论述。《清宫藏传佛教文化考察》[2]一文着重论述了藏传佛教文化在宫廷中的若干影响。

此外，还有一系列对清宫藏传佛教历史人物的研究。《章嘉呼图克图像小考——兼谈乾隆皇帝与章嘉国师的关系》[3]结合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三世章嘉像进行论述，认为乾隆皇帝除了推崇黄教之外，和三世章嘉本人的关系亦是非常密切。《乾隆与满族喇嘛寺院——兼论满族宗教信仰的演变》[4]一文提出乾隆广建藏传佛教寺庙，意在把藏传佛教推行于满族中，将宗教信仰逐步由萨满教演变为藏传佛教。此外还有《乾隆御题青玉钵》[5]《乾隆内府写本〈甘珠尔经〉》[6]等相关论文论述了藏传佛教在乾隆时期的发展表现。

关于藏传佛教宗教领袖的研究，相关论文有《六世班禅的一封奏书》[7]《民族团结的历史画卷——六世班禅画像》[8]《清宫供奉的三世达赖像》[9]《仓央嘉措的悲剧人生——清宫旧藏六世达赖唐卡解析》[10]《松赞干布画像考识》[11]，这一时期的宫廷藏传佛教历史研究仍以造像及唐卡等文物藏品为切入点进行考察，重点探讨了藏传佛教在清朝时期的发展，涉及明代之藏传佛教发展历史的研究较少。

研究初期，故宫的藏传佛教研究工作重点将庞杂的文物藏品进行整理，结合藏传佛教艺术研究学界重点进行研究，进一步开放故宫文物资源，将故宫的藏传佛教文化展现给社会大众及学术界，丰富了藏传佛教研究的内容，推动了藏传佛教研究的发展。

三　研究发展繁荣期学术成果（21 世纪初至今）

进入 21 世纪，故宫博物院藏传佛教研究进度加快，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出现了大批优秀科研成果。在整合了故宫的文物资源基础上，研究人员目光更为开阔，研究范围更加广泛，充分利用故宫藏品资源基础上，与国内外学术界研究重点相结合，成果更为丰盛，进一步推动了故宫藏传佛教研究的发展，也吸引了更多学者及社会大众的关注。

1　王家鹏：《清宫藏有关“金瓶掣签”文物析》，《文物》1995 年第 3 期。
2　王家鹏：《清宫藏传佛教文化考察》，《清代宫史丛谈》，1996 年。
3　王家鹏：《章嘉呼图克图像小考——兼谈乾隆皇帝与章嘉国师的关系》，《故宫博物院院刊》1987 年第 4 期。
4　王家鹏：《乾隆与满族喇嘛寺院——兼论满族宗教信仰的演变》，《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 年第 1 期。
5　王家鹏：《乾隆御题青玉钵》，《紫禁城》1988 年第 4 期。
6　杨玉良：《乾隆内府写本〈甘珠尔经〉》，《紫禁城》1988 年第 4 期。
7　王家鹏：《六世班禅的一封奏书》，《紫禁城》1988 年第 1 期。
8　王家鹏：《民族团结的历史画卷——六世班禅画像》，《紫禁城》1990 年第 2 期。
9　王家鹏：《清宫供奉的三世达赖像》，《紫禁城》1992 年第 6 期。
10　王家鹏：《仓央嘉措的悲剧人生——清宫旧藏六世达赖唐卡解析》，《紫禁城》1995 年第 2 期。
11　王家鹏：《松赞干布画像考识》，《紫禁城》1998 年第 3 期。



图 5 永乐铁鎏金大黑天

（一）藏传佛教艺术研究

在前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基础上，21 世纪以来的造像研究更为深入化、专题化、细致化，研究对象主要为造像、唐卡绘画及法器。《天府永藏：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概述》[1]一书介绍了两岸故宫藏品之来源、历史及现状概况等，其中“宗教文物”一节介绍了截至 2008 年时故宫博物院宗教文物的收藏概况，其中藏传佛教文物为重要组成部分。

明代宫廷造像极具特色，是当前藏传佛教艺术研究的热点，尤其集中于永宣佛像——即明代永乐、宣德时期宫廷的汉藏风格造像。永乐、宣德年间，明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对西藏地区的统治，与西藏地区的文化交流密切，汉藏文化的交流及碰撞促成了优雅华美的永宣佛像的产生。《故宫经典 · 明永乐宣德文物图典》中收录永宣佛造像十九尊，工艺复杂，技艺精湛，题材丰富。其中收录的永乐铁鎏金大黑天立像〔图 5〕、宣德铜鎏金阿閦佛像等，均为永宣造像研究的代表性作品。尽管永宣造像研究一直受到广泛关注，但对于永宣造像的认识，目前存在一些含混不清的问题，《皇家佛韵明清宫廷佛造像艺术——永宣造像考研究和收藏的焦点问题》[2]一文对永宣造像进行了详细论述，对永宣造像的造办机构、主要特征、风格来源及影响几方面进行了探讨，得出结论：目前还不能确定明代内府御用监中有专门佛作存在，鉴别永宣造像应当综合其造型、款识和封底三个要素进行判断，其风格来源应当是尼泊尔、西藏两地，又与内地风格融合而成。文章提出永宣造像研究仍存在疑点和难点，需要更多资料方能进行进一步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对永宣造像的认识。

《故宫中的西藏佛教艺术瑰宝》[3]对故宫藏传佛教藏品作了详细介绍。《故宫藏传金铜佛像题记及其分类》[4]一文对故宫所藏佛像题记进行了详细的分类解读，这些题记是西藏的原始记载，包括了清代藏传佛教高僧的鉴定记录，真实地反映了西藏对古代金铜佛造像的分类，并能够提供古代西藏各类佛像的标准器。题记是研究艺术史可参考的重要资源，此文的发表具有重要意义。

《妙谛心传——故宫珍藏传佛教文物》[5]为配合“妙谛心传——故宫珍藏传佛教文物”展览而出版，此次展览为澳门艺术博物馆承办，集中展示了宫廷藏传佛教文物，分为造像、唐卡、法器、经籍、佛堂景观五部分，收录有故宫博物院研究人员五篇论文。《藏传佛教各教派及诸神概说》[6]《明清宫廷藏传佛教佛像论述》[7]《从藏

1 郑欣淼：《天府永藏：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概述》，紫禁城出版社，2008 年。

2 罗文华：《皇家佛韵明清宫廷佛造像艺术——永宣造像考 研究和收藏的焦点问题》，《紫禁城》2014 年第 5 期。

3 王家鹏：《故宫中的西藏佛教艺术瑰宝（一）》，《中国西藏》（中文版）2001 年第 6 期。

4 王家鹏：《故宫藏传金铜佛像题记及其分类》，《藏学学刊》，2004 年。

5 澳门艺术博物馆：《妙谛心传——故宫珍藏传佛教文物》，澳门艺术博物馆，2003 年。

6 王跃工：《 藏传佛教各教派及诸神概说》，《妙谛心传——故宫珍藏传佛教文物》，2003 年。

7 王子林：《明清宫廷藏传佛教佛像论述》，《妙谛心传——故宫珍藏传佛教文物》，2003 年。

传佛教文物看西藏与内地之美术交流》[1]《清代宫廷藏传佛教殿堂与佛事》[2]《从〈喇嘛说〉看清帝藏传佛教信仰与治术之关系》[3]。

清乾隆时期是宫廷藏传佛教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汉藏艺术在此时得以频繁交流，在乾隆对藏传佛教的推崇下，这一时期的造像别具风格，既有对西藏造像的模仿，也有独特之创新。六世班禅进贡的紫金琍玛造像〔图 6〕为乾隆帝所喜爱，乾隆命造办处仿做并对原配方加以改进，独创了具有宫廷特色的紫金琍玛造像，成为清宫藏传佛教造像的珍品，相关研究论述有《清宫遗珍：紫金铜佛造像》[4]《清宫紫金琍玛造像考述》[5]《谜一样的紫金琍玛》[6]。涉及紫金琍玛造像的特征、来源、历史、配方等，丰富了学术界对于紫金琍玛造像的认识。清宫紫金琍玛与扎什琍玛关系密切，有尼泊尔造像之影响，精致美观，尊像多为紫金琍玛制作，而背光和底座多为红铜鎏金，应当也是继承了扎什伦布寺的传统，造像表面可见金色斑块亦是其重要特征。由于紫金琍玛造像多造于西藏或者宫廷，年久失色，鲜被关注，其历史价值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谜一样的紫金琍玛》一文最后提出，关于其年代能否早于 18 世纪，以及其风格来源的问题仍需继续研究探索，但当前研究成果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值得更多关注。



正面



背面

图 6　紫金琍玛宗喀巴

除了独特的紫金琍玛造像，乾隆时期的仿古造像特征同样突出，对于此方面鲜有人提及，《乾隆时期宫廷仿古佛造像》[7]一文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论述，认为乾隆时期仿古造像除了在图像学特征上与原作几乎完全相同，工艺较原作则要精致很多，体现了宫廷造像的较高水平。

故宫收藏藏传佛教造像资源十分丰富，年代跨度广泛，其中扎什琍玛佛像〔图 7〕特征明确、样式丰富、工艺精细，且大多附有皇宫特有的黄条题记，在故宫佛教造像中别具一格。《清宫扎什琍玛造像的来源及像式类型分析》[8]一文在整理清宫佛像黄条内容的基础上，结合档案资料，对扎什琍玛造像进行了来源、类型及题材风格的细化研

1　罗文华：《从藏传佛教文物看西藏与内地之美术交流》，《妙谛心传——故宫珍藏传佛教文物》，2003 年。

2　王家鹏：《清代宫廷藏传佛教殿堂与佛事》，《妙谛心传——故宫珍藏传佛教文物》，2003 年。

3　王宝光：《从〈喇嘛说〉看清帝藏传佛教信仰与治术之关系》，《妙谛心传——故宫珍藏传佛教文物》，2003 年。

4　罗文华：《清宫遗珍——紫金铜佛造像》，《荣宝斋》2007 年第 9 期。

5　罗文华：《清宫紫金琍玛造像考述》，《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 年第 6 期。

6　罗文华：《文明 谜一样的紫金琍玛》，《紫禁城》2014 年第 5 期。

7　李中路、罗文华：《乾隆时期宫廷仿古佛造像》，《紫禁城》2014 年第 5 期。

8　马云华：《清宫扎什琍玛造像的来源及像式类型分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 年第 1 期。



图 7　扎什琍玛观音菩萨

究，进一步说明了扎什琍玛对清宫佛教造像风格的深刻影响，以及在促进西藏与内地各方面联系方面发挥过的历史作用。

《一尊四臂观音像 祖孙两代情意浓》[1] 一文以康熙帝为其祖母太宗孝庄文皇后铸造的四臂观音造像为研究对象，借此详述了孝庄及康熙间身后的祖孙情谊，认为此尊四臂观音造像为其情谊之象征，具有独特价值。

随着对藏传佛教造像及艺术风格研究的进一步系统化，陆续出版的专著有《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 · 金铜佛》[2]《中国藏传佛教金铜造像艺术》[3]《图像与风格：故宫藏传佛教造像》[4]《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藏传佛教造像》[5]《故宫经典：藏传佛教造像》[6]，系统介绍了故宫博物院的佛像藏品，研究成果逐步细化，宫廷造像文物来源明确，历史意义重大，对于藏传佛教造像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 · 藏传佛教造像》将故宫收藏藏传佛教造像大体分为西藏周边地区类型、西藏本地类型、内地类型三类，收录之造像多具有代表性，风格多样。《故宫经典：藏传佛教造像》为《图像与风格：清宫藏传佛教造像》[7] 的再版，对原版进行了修改补充，《图像与风格：清宫藏传佛教造像》着重介绍每件藏品的风格与造像内容，再版阐述了藏传佛教神系的成立与完善，增加了祖师一类，将所收录造像藏品按照祖师、本初佛和五方佛、本尊、般若佛、菩萨、女尊、护法的分类进行划分，使藏传佛教神系得以完善，全书结构更为完整。

《中国古代雕塑述要》[8] 中第三章收录有故宫收藏藏传佛教金铜造像，并在第五章有关于阿尼哥和刘元的论述。藏传佛教造像以金铜材质为主，此外也有其他材质的造像及法器。《奇幻瑰丽：清代宫廷藏瓷制藏传佛教精品》[9] 对清宫的瓷制藏传佛教艺术品做了介绍。《18 世纪清宫佛堂供龛的样式及其艺术特征》[10] 一文从归纳清宫供龛的基本样式和龛与像的关系出发，对供龛的艺术特征及其所体现的时代精神、宗教情感等方面进行了探讨。研究佛教造像的同时，对其供奉形式的研究鲜有涉及，此文发表弥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擦擦佛是藏传佛教造像之独特形式，《咸若馆供藏擦擦佛整理研究——兼及与《诸佛菩萨圣像赞》之比较》[11] 一文在对咸若馆供藏擦擦佛的整理的基础上，将 4233 尊擦擦中唯一完整的一套 360 佛与《诸佛菩萨圣像赞》进行比较，

1　李中路：《一尊四臂观音像 祖孙两代情意浓》，《紫禁城》2006 年第 7 期。
2　王家鹏：《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 • 金铜佛》，北京美术出版社，2002 年。
3　王家鹏、杨新等：《中国藏传佛教金铜造像艺术》，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 年。
4　故宫博物院编：《图像与风格：故宫藏传佛教造像》，紫禁城出版社，2002 年。
5　王家鹏：《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 • 藏传佛教造像》，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3 年。
6　罗文华：《故宫经典：藏传佛教造像》，紫禁城出版社，2009 年。
7　罗文华：《图像与风格：清宫藏传佛教造像》，紫禁城出版社，2002 年。
8　冯贺军：《中国古代雕塑述要》，紫禁城出版社，2007 年。
9　马云华：《 奇幻瑰丽：清代宫廷藏瓷制藏传佛教精品》，《紫禁城》2006 年第 1 期。
10　何芳：《18 世纪清宫佛堂供龛的样式及其艺术特征》，《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 年第 4 期。
11　文明、罗文华：《咸若馆供藏擦擦佛整理研究——兼及与〈诸佛菩萨圣像赞〉之比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 年第 5 期。

一致度高达 98.3%，得出结论，咸若馆之擦擦佛应当是利用三世章嘉编订的三百六十佛铜阴佛模制作而成。关于法器的论述有：《乾隆中期宫廷铜法铃制作的创新与变化》[1] 以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乾隆款铜法铃为研究对象，结合清代档案和史料，就乾隆中期宫中铸铃的配方试验、尺寸、款识、纹饰变化以及铜法铃的使用情况进行了探讨。《清宫藏传佛教嘎布拉法器初探》[2] 以现存的嘎布拉法器为实物依据，结合清代史料、档案等，对清宫嘎布拉法器的来源、形制、加工、佛堂供奉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清宫藏传佛教法器供器概述》[3] 一文对清宫法器作了详细介绍。



图 8　旃檀佛

除了藏传佛教造像、法器，清宫中还有一些器物具有明显的藏传佛教风格。《清宫藏传佛教瓷器赏论》[4]《清宫旧藏藏传佛教风格瓷器与帝王宗教信仰》[5] 着重讨论了清宫旧藏中属于元明清时期的大量带有藏传佛教风格的瓷器，结合丰富的档案资料，探讨了帝王的宗教信仰，以及对瓷器制作的影响。

对馆藏造像的样式、风格分析归类论述成果较多，此外亦有对佛像制作过程的论述，包括《乾隆时期宫中佛像制作考》[6]《档案所见乾隆时期宫廷佛像制作及其艺术成就》[7]《西藏与宫廷——乾隆时期藏传佛教铜法物加工技术之选择与引进》[8] 等。

这一时期，藏传佛教图像学的研究取得了进一步发展。关于藏传佛教尊神的论述有《多闻天》[9]《猪年 • 猪神 • 积光佛母》[10]，关于旃檀佛像〔图 8〕有较多研究论述发表，《故宫发现旃檀瑞像杂记》[11]《帝王与旃檀瑞像》[12] 详细介绍了故宫的旃檀瑞像。清代宫廷对白伞盖佛母的崇拜显著，宫中大量制作白伞盖佛母像，北京及周边地区的各大寺庙有精美的白伞盖佛母绘画和雕塑，当时甚至兴建寺院来供奉白伞盖佛母像。《白伞盖佛母：汉藏佛教的互动》[13]《清宫大白伞盖佛母信仰探析》[14] 借助清宫档案及现存清代原状佛堂内白伞盖佛母的陈设情况，探讨了清宫白伞盖佛母信仰目的及来源发展。

关于藏传佛教图像学，这一时期出版有重要专著。2009 年，《诸佛菩萨圣像赞》[15] 得以影印出版，引起了

1　李中路：《乾隆中期宫廷铜法铃制作的创新与变化》，《故宫博物院院刊》第 12 辑 2014 年第 3 期。
2　李中路：《清宫藏传佛教嘎布拉法器初探》，《故宫学刊》2014 年。
3　李中路：《清宫藏传佛教法器供器概述》，《文物世界》2014 年第 4 期。
4　刘伟：《清宫藏传佛教瓷器赏论》，《收藏家》2004 年第 9 期。
5　刘伟：《清宫旧藏藏传佛教风格瓷器与帝王宗教信仰》China Tibetology，2004 年第 1 期。
6　王子林：《乾隆时期宫中佛像制作考》，《清代宫史研究会：清代皇宫礼俗》2003 年第 8 期。
7　王子林：《档案所见乾隆时期宫廷佛像制作及其艺术成就》，《台湾故宫学术季刊》，2001 年。
8　罗文华：《西藏与宫廷——乾隆时期藏传佛教铜法物加工技术之选择与引进》，《宫廷与地方：十七至十八世纪的技术交流》，2010 年。
9　王子林：《多闻天》，《紫禁城》2002 年第 1 期。
10　文明：《猪年 · 猪神 · 积光佛母》紫禁城 2007 年第 2 期。
11　王家鹏：《故宫发现旃檀瑞像杂记》，《收藏家》，2001 年第 3 期。
12　王家鹏：《帝王与旃檀瑞像》，《紫禁城》2005 年第 1 期。
13　王微、罗文华：《白伞盖佛母：汉藏佛教的互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 年第 5 期。
14　马云华：《清宫大白伞盖佛母信仰探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 年第 5 期。
15　罗文华：《诸佛菩萨圣象赞》，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 年。



图 9 释迦牟尼佛唐卡

广泛关注。《诸佛菩萨圣像赞》是属于清代宫廷的图像学著作，由章嘉国师主编，乾隆朝时期增订绘画成册。此书曾对乾隆时期的藏传佛教发展有过深刻的影响，相关论述还有《妙相庄严——〈诸佛菩萨圣像赞〉考》[1]。《五百佛像集 • 见即获益》[2]2011 年出版，为瑞士苏黎世大学民族学博物馆之版本，是重要的藏传佛教图像学丛书，对于藏传佛教图像学研究有重要意义。

故宫唐卡藏品以清宫旧藏为主，主要为清宫 17、18 世纪作品，绘制内容包括佛、菩萨、度母、罗汉、护法、祖师像、曼陀罗图像等。多为单幅画像，也有成套组合的多幅组画，如释迦牟尼画传〔图 9〕、宗喀巴画传、历世达赖、班禅等。进贡的唐卡主要是历世达赖、班禅所献，代表了 17、18 世纪西藏绘画的最高水平，这些唐卡也为研究清宫藏传佛教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素材。作为清乾隆时期宫中修建的具代表性的藏传佛教建筑，雨华阁对清代宫廷佛教图像及相关神系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雨花阁唐卡辨析》[3]《雨华阁唐卡辨析续论——兼论与〈诸佛菩萨圣像赞〉之关系》[4] 通过对雨花阁每层、每组唐卡的排比分析，分析了这些图像的宗教意义，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阐明了雨华阁唐卡陈设的指导思想，同时，指出其陈设与章嘉国师《诸佛菩萨圣像赞》一书的编辑思想之间有诸多相似之处。

写真画唐卡属清宫独创，产生于乾隆时期，融合了多种绘画技法，包括西藏唐卡技法、西洋写实技法和中国传统的青绿山水技法，直接对描绘者写生，人物形象生动逼真。故宫现存的《六世班禅佛像》、《三世章嘉佛像》、《乾隆皇帝佛像》等均属写真画唐卡，为传统唐卡增添了新的活力。《〈六世班禅画像〉唐卡考证》[5] 一文根据档案记载对《六世班禅画像》唐卡的制作时间、作者、内容进行了考证，阐释了此种样式的形成及对清宫唐卡创作的影响。《乾隆时期的写真画唐卡》[6] 进一步对写真画唐卡进行了分析论述。

清宫还供奉有大量藏风浓郁的十六或十八罗汉唐卡组画，将其名称、图像特征、排列顺序、绘画风格等方面与清官旧藏的内地罗汉图相比，同中存异。乾隆及藏传佛教高僧在对藏传佛教图像进行系统化与规范化的同时，包括了汉藏两地均流传广泛的十六、十八罗汉，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乾隆时期清宫特色的十八罗汉图像标准。《乾隆朝清宫十八罗汉唐卡名相解析》[7] 对此作了详细论述。

关于清宫收藏唐卡的研究，兼及其绘制、装裱、机构等诸多方面。《清宫唐卡画师与画佛像喇嘛》[8] 指出

1 罗文华：《妙相庄严——〈诸佛菩萨圣像赞〉考》，《中国 • 承德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703 ～ 2003 清史研究与避暑山庄》。
2 罗文华：《五百佛像集 · 见即获益》，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 年。
3 罗文华：《雨华阁唐卡辨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 年第 3 期。
4 罗文华：《雨华阁唐卡辨析续论——兼论与〈诸佛菩萨圣像赞〉之关系》，《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 年第 4 期。
5 王子林：《〈六世班禅画像〉唐卡考证》，《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 年第 4 期。
6 王子林：《乾隆时期的写真画唐卡》，《中国书画》2004 年第 3 期。
7 何芳：《乾隆朝清宫十八罗汉唐卡名相解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 年第 4 期。
8 罗文华：《清宫唐卡画师与画佛像喇嘛》，《紫禁城》2005 年第 4 期。

清宫唐卡绘画主要是由紫禁城中正殿画佛像喇嘛完成的，乾隆朝各民族文化大交融时期，宫中的著名西洋、汉族画师也参与了唐卡绘画。《清宫唐卡绘画与装裱的机构及流程》[1]一文在故宫博物院现存的清代唐卡研究基础上，参考大量清代内务府原始档案，将清朝宫廷绘制藏传佛教唐卡的机构以及后期装裱流程梳理出来，并将藏区和清宫唐卡在工艺和用料上的不同加以比较。此外还有《乾隆时期宫廷藏传佛教绘画研究》[2]《清宫藏传佛教绘画的机构与画师——以乾隆朝(1736 ～ 1796 年)为主》[3]《唐卡保护中的传统绘画技术传承》[4]等相关论述。

此外，关于明代的唐卡亦有研究论述，《西方收藏明朝成化与正德时期汉藏风格的唐卡》专门系统论述了西方研究与明代宫廷相关的唐卡藏品[5]。

这一时期，出版故宫收藏唐卡的专著《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藏传佛教唐卡》[6]。书中所收录唐卡，按照质地，分为绘画唐卡与织锦唐卡，书中将唐卡按照藏传佛教诸神等级传统进行分类排列：祖师、密教本尊、佛、菩萨、佛母、护法、坛城。这批唐卡艺术精华集中反映了西藏唐卡艺术在内地传播发展的面貌，展现了宫廷唐卡的特征，其中收录的组画具有系统性与完整性，对研究唐卡艺术风格及图像学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古代佛教版画的刻印往往与《大藏经》的刊刻有关，入清之后，佛经雕版印刷逐渐在西藏繁荣兴盛，形成了以寺院为主的多座大型印经院，纳塘寺设有著名的纳塘印经院。《西藏纳塘寺版画遗珍考》[7]一文介绍了新发现的一组纳塘寺版画。意大利学者图齐于 1949 年出版《西藏画卷》，第二卷发表纳塘寺版画 33 幅，并做了详细说明和研究，文章将新见 51 幅版画与图齐所发表资料进行对比，证实其来源为纳塘寺。新见版画为三组《释迦牟尼佛源流》《宗喀巴画传》《十八罗汉与四大天王》，尺寸较大，布局有序，线条繁密而层次分明，工艺水平极高。这其中 30 幅《释迦摩尼佛源流》版画与故宫所藏一套《释迦牟尼佛源流》31 幅唐卡为同一版本，《宗喀巴画传》与故宫梵华楼明间二楼宗喀巴佛堂供奉的三幅《宗喀巴源流》唐卡画像很多细节绘画相似。此三套版画的发现意义极为重大，品相完好，数量可观，刷印年代或许为清代，有可能为乾隆时期版本，是珍贵的文物遗存。

《萨迦 – 元时期尼藏与藏汉金属造像存在阿尼哥风格吗》[8]一文通过比较世界各地保存的 13 世纪中期至 14 世纪上半叶制作的造像和绘画，考证出其中一些作品具有“阿尼哥风格”。

密宗是藏传佛教的核心内容之一，密宗尊神是藏传佛教神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图像复杂，变化多样，是研究的重点，关于密宗尊神图像及信仰的研究在此时期成果突出。在密宗尊神图像中，同一种尊神有不同形象的情况极为常见，故宫博物院所藏佛像中“白上乐”佛像为清宫旧藏，用于长寿修法，但样式并不常见，《五百佛像集》中也有一尊用于长寿修法的白上乐，身形与清宫白上乐形象完全不同。《清宫藏“白上乐王佛”

1 罗文华：《清宫唐卡绘画与装裱的机构及流程》，《中国藏学》，2005 年第 4 期。
2 罗文华等：《乾隆时期宫廷藏传佛教绘画研究》，《故宫学刊》，2005 年第一辑。
3 罗文华：《清宫藏传佛教绘画的机构与画师——以乾隆朝（1736 ～ 1796 年）为主》，《第二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综》，2006 年。
4 罗文华：《唐卡保护中的传统绘画技术传承》，《国际唐卡艺术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青海论坛论文集》，2010 年。
5 魏盟夏、罗文华：《西方收藏明朝成化与正德时期汉藏风格的唐卡》，《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 年第 5 期。
6 王家鹏、王子林：《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 • 藏传佛教唐卡》，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3 年。
7 谢继胜、罗文华、石岩刚：《汉藏佛教美术研究 第四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5 期。
8 米夏埃尔 · 汉斯文：《萨迦 - 元时期尼藏与藏汉金属造像存在阿尼哥风格吗？》，《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 年第 5 期。

图像溯源》[1]一文集中讨论了故宫博物院所藏佛像中“白上乐”的来源及原因，以及与《五百佛像集》中“白上乐”的异同。藏传佛教尊神之图像特征并非一成不变，故宫博物院现藏哈里哈里哈里观音唐卡，是六世班禅进献给乾隆皇帝的礼物，应为 18 世纪西藏制作，《哈里哈里哈里观音图像初探》[2]一文以对故宫博物院现藏哈里哈里哈里观音唐卡的研究为基础，着重探讨了哈里哈里哈里观音在不同地域的特征、图像演变及相关问题。此外，《密教中的八大尸林》[3]一文从含义到内容，对密教中的尸林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和分析，并将布顿大师著作中关于尸林的详细描述进行了翻译。曼荼罗是藏传佛教密宗的一部分，《续部总集》是与曼荼罗相关的集大成之作。喜金刚曼荼罗作为母续曼荼罗中最为常见的种类之一，为西藏各个流派所重视。因流派之不同，喜金刚曼荼罗在图像上也存在着差异，这些不同种类的喜金刚曼荼罗在《续部总集》中有着详细的描述，《〈续部总集〉中记述的喜金刚曼荼罗》[4]一文就《续部总集》中的喜金刚曼荼罗进行了详细探讨论述。

《坦荼罗部集成》是 19 世纪末由蒋扬洛特旺波主持编纂的藏语文献总计，包括 19 世纪西藏曼荼罗相关文献，涉及藏传佛教各个宗派。《〈坦荼罗部集成〉中的秘密集会曼荼罗》[5]一文从秘密集会曼荼罗入手，论述了《坦荼罗部集成》中的秘密集会曼陀罗的种类与构造，对照了其中的相关文献，得出结论，可以辨明《坦荼罗部集成》中秘密集会曼荼罗相关文献的两个特征：一、秘密集会曼荼罗中，由萨迦派而来的占大多数；二、详尽描述曼荼罗各个尊格的持物、身色等图像特征是其表现出的倾向之一。

《究竟瑜伽鬘》是佛教图像学领域的重要著作之一，这些著作内容的公布是藏传佛教美术研究的基础工作。2009 年，故宫博物院与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合作，开展了《究竟瑜伽鬘》汉译项目。《〈究竟瑜伽鬘〉中的“四十三尊文殊金刚曼荼罗”》[6]一文将其中第二十章的初译稿公布，有助于提供研究者使用和参考。

（二）藏传佛教经典研究

与对佛像及唐卡绘画的研究相比，藏文经典研究相对较少。在宫廷藏传佛教经典方面，关于明人书内府金藏经有研究论述。根据《秘殿珠林》记载，乾清宫曾收藏 4 部明朝宫廷抄写的佛教经咒集，均题作“明人书内府经藏金”，可惜已散佚不存。故宫博物院尚有 3 部类似的抄本存世，但未见《秘殿珠林》著录。《故宫藏明内府金藏经》[7]一文指出，未有明确依据可以证明抄本为永乐皇帝所书，内府金藏经的准确年目前并不能确定，但从其书体风格来看，离永乐时期不会太远。《明人书内府金藏经考——兼论 14、15 世纪汉藏绘画风格的要素》[8]研究更为深入，结合对明人书内府金藏经的考证，论述了 14、15 世纪的汉藏绘画风格。

《故宫藏永乐北藏重刊谈略》[9]简要介绍了《永乐北藏》之来源，始刊于明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 年），于

1 张雅静：《清宫藏“白上乐王佛”图像溯源》，《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 年第 4 期。
2 张雅静：《哈里哈里哈里观音图像初探》，《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 年第 1 期。
3 张雅静：《密教中的八大尸林》，《世界宗教研究》2014 年第 1 期。
4 张雅静：《〈续部总集〉中记述的喜金刚曼荼罗》，《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 年第 1 期。
5 谢继胜：《汉藏佛教美术研究 2008》，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
6 谢继胜、罗文华、石岩刚：《汉藏佛教美术研究　第四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
7 罗文华：《故宫藏明内府金藏经》，《紫禁城》2003 年第 3 期。
8 罗文华：《明人书内府金藏经考——兼论 14、15 世纪汉藏绘画风格的要素》，《藏学学刊》，2004 年。
9 翁连溪：《故宫藏永乐北藏重刊谈略》，《收藏家》2001 年第 1 期。

正统五年（1440 年）完成，亦称《大明三教圣教北藏》，是明代官刻《大藏经》中收经典最多，保存最完整的一部。《满文大藏经》原刊行于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五年（1773 ～ 1790 年），刊行原因除了宗教信仰之外，还有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因素。当时汉、蒙文《大藏经》均已刊行，却还缺乏清王朝自己民族文字的《大藏经》。乾隆特颁谕旨，开清字经馆，进行满文翻译，历时 18 年，共编译佛教经典 699 种，共计 2535 卷，是目前传世的唯一的满族文字《大藏经》。当时仅印行十二部，深藏诸皇家寺院，并未广泛流通，因此鲜为人知。现仅有两套存世，其中一套一分为二，76 函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32 函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另一套基本完整，存于西藏布达拉宫。《满文大藏经》有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对《满文大藏经》的研究出版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此研究成果公布之前，很多学者甚至怀疑其是否真的存在。《乾隆版满文〈大藏经〉刊刻述略》[1]一文，以相关的档案与实物资料为依据，对满文《大藏经》刊刻的起因、年代、刷印部数及佛经中的插图版画、经卷装潢作了简要的论述。《藏传佛教众神：乾隆版满文大藏经绘画》[2]一书出版，在对尘封了两个多世纪的数万块经版的重新清理修补基础上，将残缺部分补足，印成目前最为完整的《满文大藏经》，展示给世人。《〈满文大藏经〉藏传佛教绘画——兼及尊神名号中的满文阿礼嘎礼字》[3]一文首次对其中尊神名号给予确认，对其绘画内容及艺术风格进行了研究论述。《满文〈大藏经〉藏传佛教绘画》[4]着重介绍了其经版上的绘画。《满文大藏经》中的插图不仅色彩鲜艳，而且尊神的法器、手印、坐姿均非常清晰，图像学研究价值极高。将其 108 函经夹板上的彩色绘画全部刊行对藏传佛教图像学和艺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绘画及艺术研究基础上，研究兼及满文阿礼嘎礼字——《乾隆时期满文阿礼嘎礼字研究——从〈同文韵统〉、〈大藏全咒〉到满文〈大藏经〉》[5]，以及其编纂历史，《满文〈大藏经〉编纂考略》[6]依据清宫旧藏档案，结合清代、民国文献，对满文《大藏经》从开始编纂的时间，编纂缘起，编纂原则，刊印数目，使用经费，主要供奉地，参与的藏汉僧人等方面做了较为深入的考证。《〈清文翻译全藏经〉》研究五题[7]论述了为《清文翻译全藏经》正名、《清文翻译全藏经》翻译刻印起止时间研究综述、《清文翻译全藏经》工程于乾隆三十六年开始启动、《清文翻译全藏经》的修书机构以及《清文翻译全藏经》在乾隆五十九年刻印完成。《清文全藏经》译刻起止时间研究[8]进一步详细论述了译刻的起止时间。manju hergen i ubaliyambuha amba g‘anjur nomun 的新拟书名为《满文大藏经》或《清文全藏经》，这与书序名称及书名著录原则均不符，该满文古籍应定书名为《清文翻译全藏经》，全称为《御译清文翻译全藏经》。《清文翻译全藏经》丛考[9]一文，对《清文翻译全藏经》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梳理，同时对书名、修书机构、译刻人员等问题进行了专题探讨。

《关于康熙版蒙古文〈甘珠尔〉经的刊刻》[10]利用清代满、蒙文档案文献，对办理康熙版蒙古文《甘珠尔》

1 翁连溪：《乾隆版满文〈大藏经〉刊刻述略》，《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 年第 6 期。
2 罗文华：《藏传佛教众神：乾隆版满文大藏经绘画》，紫禁城出版社，2002 年。
3 罗文华：《〈满文大藏经〉藏传佛教绘画——兼及尊神名号中的满文阿礼嘎礼字》，《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 年第 3 期。
4 罗文华：《满文〈大藏经〉藏传佛教绘画》，《中国书画》2004 年第 3 期。
5 罗文华：《乾隆时期满文阿礼嘎礼字研究——从〈同文韵统〉、〈大藏全咒〉到满文〈大藏经〉》，《燕京学报辑刊》2004 年第 17 期。
6 罗文华：《满文〈大藏经〉编纂考略》，《中国历史文物》2005 年第 3 期。
7 章宏伟：《〈清文翻译全藏经〉研究五题》，《故宫博物院八十华诞暨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 年第 5 期。
8 章宏伟：《〈清文全藏经〉译刻起止时间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6 年第 5 期。
9 章宏伟：《〈清文翻译全藏经〉丛考》，《满语研究》2008 年第 2 期。
10 李保文：《关于康熙版蒙古文〈甘珠尔〉经的刊刻》，《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 年第 5 期。

经的缘起、主事者、蓝本来源、校勘经过、誊写及镌刻人员、刊刻场所、经版存放地点、经费预算及其来源、经费之收掌等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考述。

在宫廷藏传佛教密宗经典研究方面，《究竟定：清宫藏密瑜伽修行宝典》[1]的出版极大丰富了藏传佛教密宗研究的资源。《究竟定：清宫藏密瑜伽修行宝典》是以萨迦派本续喜金刚究竟定为主，补充其他藏密重要本续究竟定而成。这是一部独一无二的著作，是首次发现的完整的有关藏密瑜伽修行法的汉藏两种文字对照版本，并附以了彩图说明。

《佛说造像量度经》是一部与藏式佛教绘画和造像的比例、尺度有关的重要经典，自乾隆六年（1741 年）工布查布译就之后，中国学者鲜有对它进行深入研究者，《〈造像量度经〉研究综述》[2]综合了世界主要学者对此经典及与之相关的梵、藏文经典的研究成果，并就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表述了自己的观点。

《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 • 善本特藏编 8 • 满文古籍》[3]、《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 • 善本特藏编 9 • 蒙文古籍》[4]中收录故宫博物院满文、蒙文古籍旧藏，其中一部分为藏传佛教经典，配有图片及简介。《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 • 善本特藏编 8 • 满文古籍》中收录《清文翻译全藏经一百八卷目录一卷》，为乾隆五十九年章嘉三世若必多吉等奉敕译。《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八十卷目录八卷》，为乾隆三十九年允禄等奉敕撰，三世章嘉若必多吉校。《丹书克经》，咸丰十一年洞阔尔呼图克图著。《白伞盖仪轨经》，乾隆四十五年武英殿刻汉满蒙藏合璧本。《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 • 善本特藏编 9 • 蒙文古籍》中收录有《甘珠尔经目录佛名》、《释迦牟尼纪传经》、《诸佛事略图说附彩绘佛像》、《毗卢佛坛城经》、《绿像救度佛母赞》等。其中有一些为满蒙藏汉合璧本。此专著收录内容丰富，对于了解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藏传佛教经典具有参考意义。

抄写佛经，在佛教上被称为转经。清宫写经常配制精致考究的函套、书匣和书盒等，是美妙绝伦的文化艺术珍品，《心清闻妙香（清宫善本写经）》[5]、《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 • 善本特藏编 16 · 御笔写经》[6]、《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 • 善本特藏编 17 · 臣工写经》[7]收录了皇帝和臣工所抄写之佛经，将其作了归纳整理，展示故宫博物院藏品的总体面貌。

（三）宫廷藏传佛教佛堂研究

关于宫廷藏传佛教建筑的研究，在前期对建筑形制及陈设的研究基础上，将其与藏传佛教密宗思想相结合以作研究探讨，推动了清宫藏传佛教文化研究的发展。

《紫禁城里的宗教》[8]一书中，《喇嘛教佛堂》一文，介绍了宫廷内部的藏传佛教佛堂建筑。《雨花阁原状陈设》[9]一文图文并茂〔图 4〕，结合雨花阁原状陈设论述了乾隆皇帝与黄教的关系，认为乾隆建雨花阁为兴黄

1 罗文华、王微：《究竟定：清宫藏密瑜伽修行宝典》，紫禁城出版社，2009 年。
2 魏查理、罗文华：《〈造像量度经〉研究综述》，《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 年第 2 期。
3 春花：《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 • 善本特藏编 8 • 满文古籍》，故宫出版社，2014 年。
4 春花：《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 • 善本特藏编 9 • 蒙文古籍》，故宫出版社，2014 年。
5 故宫博物院编：《心清闻妙香（清宫善本写经）》，紫禁城出版社，2009 年。
6 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 • 善本特藏编 16 • 御笔写经》，故宫出版社，2014 年。
7 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 • 善本特藏编 17 • 臣工写经》，故宫出版社，2014 年。
8 王宝光：《紫禁城里的宗教》，紫禁城出版社，2001 年。
9 王子林：《雨花阁原状陈设》，《紫禁城》2008 年第 1 期。

教之举，提出雨花阁为仿托林寺所建，意在使它成为清宫宣扬密宗四部精神的中心佛殿，具有独尊地位，详细阐述了雨花阁之原装陈设以及其所代表的密宗四部思想，雨花阁之原状及宗教意义得到进一步阐述。《雨花阁：乾隆朝宫廷佛堂建设主导思想论》[1]一文从雨花阁的修建原由、时间和供奉内容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雨花阁是清宫的佛堂中心，其供奉虽然遵循佛教经典而陈设供奉，但却渗入了浓厚的皇权思想，揭示了佛堂背后隐藏的乾隆皇帝建设佛堂的主导思想，奠定了众佛堂发展的基调。

中正殿是清朝时期重要的佛教活动中心，对此区域的研究历来为重点。《中正殿香云亭内部陈设考》[2]一文，通过整理中发现的正殿火场残档资料，证实了清宫中正殿区域重要的佛堂香云亭的建筑年代当在乾隆十三年之前，其内部陈设反映了具有藏传佛教色彩的《金刚界曼陀罗》和《法界语自在曼陀罗》合一的主题。《清代中正殿的陈设思想及其宗教职能考》[3]通过对新旧档案资料的梳理，同时结合清代宫史著述、宫中内务府的文献，逐次分析了中正殿正殿、东西配殿及后殿这一清宫藏传佛教核心区域的内部陈设的模式、陈设内容及形成过程，阐述了中正殿及其附属佛堂的主要宗教职能及意义。《清宫中正殿及其收藏的藏传佛教文物》[4]一文对中正殿及其文物做了详细介绍。

六品佛楼是按照藏传佛教格鲁派对密宗修行者不同的修行程度和内容，分别供奉不同相应的佛像、法器及佛塔的建筑，是乾隆时期对密宗四部神系完整化和系统化的建构，是极为珍贵的藏传佛教图像学宝库，对于六品佛楼的建筑沿革、内部陈设及佛教象征意义的探讨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乾隆二十二年至乾隆四十七年（1758 ～ 1783 年），清宫先后修建了八座六品佛楼，现今其中多数已经面目全非。《清宫六品佛楼模式的形成》[5]一文，依据《活计档》、《奏销档》、《陈设档》等文献资料，梳理出六品佛楼模式形成的过程以及内部陈列形式。故宫现存两座六品佛楼——梵华楼和宝相楼。其中供奉的唐卡和铜造像中，尊神的汉、藏文名号非常丰富，《故宫六品佛楼诸尊名号考释例举——以梵华楼、宝相楼为基础》[6]一文，指出了尊神名号的汉藏文题刻错误、汉译名的不准确性以及东西方学者在复原其梵文名号时的一些错误，并作了修正，为拓展乾隆时期清宫六品佛楼的研究方向作了有益的尝试。此外，出版专著系列《梵华楼》[7]，共有四卷，是集建筑与文物于一体，在梵华楼室内外建筑的测量、照相、制图，全部文物的整理核对、测量、照相、制图基础上，查找清代档案资料、考证建筑与文物历史完成的考察报告。全书收入图版一千四百余幅，墨线图一百四十九幅，文字三十四万字。大至建筑构造，小至佛造像、唐卡的细微之处，全面展示了梵华楼的方方面面，是一部文字准确、图版清晰的梵华楼档案，呈现了故宫现存建筑最完好、保存文物最丰富的六品佛堂。此书出版对于研究清代的民族与宗教关系、汉藏佛教文化艺术交流有重要意义。

此外，还有《宝华殿的陈设与宗教功能》[8]《佛日九层悬最上 智珠三界证真如——佛日楼内部景观陈设》[9]

1 王子林：《雨花阁：乾隆朝宫廷佛堂建设主导思想论》，《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 年第 4 期。
2 罗文华：《中正殿香云亭内部陈设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 年第 4 期。
3 罗文华：《清代中正殿的陈设思想及其宗教职能考》，中国紫禁城学会，2007 年。
4 马云华：《清宫中正殿及其收藏的藏传佛教文物》，《收藏家》2009 年第 12 期。
5 罗文华：《清宫六品佛楼模式的形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 年第 4 期。
6 罗文华：《故宫六品佛楼诸尊名号考释例举——以梵华楼、宝相楼为基础》，《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 年第 3 期。
7 王家鹏：《梵华楼》，故宫出版社，2009 年。
8 罗文华：《宝华殿的陈设与宗教功能》，《故宫学刊》2006 年第 3 辑。
9 文明：《佛日九层悬最上 智珠三界证真如——佛日楼内部景观陈设》，《紫禁城》2008 年第 12 期。

等文章，在探讨原状陈设基础上探讨了清宫藏传佛教文化。《佛日九层悬最上 智珠三界证真如——佛日楼内部景观陈设》一文详述了佛日楼内部的佛像、唐卡、法器陈设，包括其中供奉的五方佛、绘制的三十五佛及五供，有助于帮助人们了解宫廷内部佛国世界及清宫藏传佛教信仰。《清宫述闻》[1]一书中有专门章节论述内廷建筑，包括藏传佛教佛堂建筑等。

《清宫西方极乐世界佛堂与乾隆“万民长寿”的理想》[2]根据经典论述了历史上西方极乐世界之信仰，通过考据历史文献及清宫档案，推测历代帝王对极乐世界的崇信，尤以乾隆为甚，清宫中有数座西方极乐世界道场，多为乾隆时期开辟，包括雨花阁、重华宫、养和精舍、抑斋西方极乐世界道场及香云亭供奉的唐卡《西方极乐世界》。作者发现，在乾隆所建筑的西方极乐世界中，罗汉供奉与西方极乐世界供奉组合在一起，认为罗汉在西方极乐世界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众生进入西方极乐世界的超度者，罗汉具有双重性格，入世拯救众生，出世逍遥，而宁寿宫花园的主题与之切合，作者认为，这种精神意义上讲，罗汉即是乾隆，精神是相通的。乾隆的无量圣界具有新意，即万民长寿，天下太平。《在乾隆的星空下：乾隆皇帝的精神境界》[3]一书对乾隆的无量圣界亦有论述。

紫禁城原状，指清逊帝溥仪撤出紫禁城后没有被改造过的宫殿及其室内外陈设。原状的文物仍保持原来的状态，集中了丰富的信息资源，涉及政治、文化、思想、个人喜好等诸多方面。《紫禁城原状与原创（上下）》[4]以明清紫禁城最具有代表性的原状宫殿为研究对象，阐释了原状宫殿的建筑形式、历史沿革、室内外陈设等方面。关于藏传佛教原状佛堂及陈设有诸多论述和考证，包括：中正殿是乾隆帝灌顶之处、雨花阁与宫廷佛堂主导思想、仙楼佛堂与乾隆帝的养心养性、养心殿仙楼佛堂的唐卡陈设、梵宗楼的陈设思想、乾隆帝的佛事活动及其目的。

《明清皇宫陈设》[5]一书按照宫廷原状的功能进行了系统科学的分区阐述，并将书中所录的陈设档按照室内和器物所在的空间次序进行了整理，记录了明清宫殿的陈设特点及用途。全书共有十个章节，分别介绍了明清室内的摆放特点及各种功能和用途，是一部学术价值较高的工具书。其中第八章专门介绍了佛堂陈设，包括中正殿、慧曜楼、静室、凝晖堂、英华殿、佛日楼里的陈设。

（四）明清宫廷藏传佛教历史研究

《宫廷内宗教信仰的精神世界》[6]一文对宫廷的宗教信仰做了概述，指出清代宫廷中宗教活动频繁，汉地佛教、藏传佛教、道教、萨满教等宗教活动形形色色，宫廷中弥漫着浓重的宗教气氛。《清代驻京喇嘛管理机构考略》[7]《乾隆时期宫中内监僧制度考》[8]对喇嘛的管理制度进行了研究论述。

---

1 章乃炜：《清宫述闻》，紫禁城出版社，2009 年。

2 王子林：《清宫西方极乐世界佛堂与乾隆“万民长寿”的理想》，《汉藏佛教美术研究 第四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14 年。

3 王子林：《在乾隆的星空下：乾隆皇帝的精神境界》，紫禁城出版社，2011 年。

4 王子林：《紫禁城原状与原创》，紫禁城出版社，2007 年。

5 王子林：《明清皇宫陈设》，紫禁城出版社，2011 年。

6 王家鹏：《宫廷内宗教信仰的精神世界》，《上海文博论丛》2006 年第 1 期。

7 罗文华：《清代驻京喇嘛管理机构考略》，《明清论丛》，2003 年第 4 辑。

8 罗文华：《乾隆时期宫中内监僧制度考》，《故宫博物院八十华诞暨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2005 年。

作为由多民族组成的强大帝国，清朝时期，佛教是各民族文化交流联系的纽带，也是帝国得以统一、稳固的基础。清朝历史上，乾隆与藏传佛教的关系最为密切，研究成果集中于以乾隆为中心的宫廷藏传佛教文化研究，包括对乾隆本人的宗教信仰之探究，以及此种背景下的宫廷藏传佛教之发展，以及中央与少数民族之关系如何在藏传佛教影响下发展。

《汉藏交融 清代佛像艺术的主旋律》[1]一文对清代佛像艺术做了整体论述，指出这一时期佛像艺术融合了汉藏艺术特征。《清代宫廷藏传佛教殿堂与佛事》[2]结合宫廷档案，对宫廷藏传佛教佛堂分布及相关佛事活动作了详细论述。

清朝时期，藏传佛教不仅关系到西藏地区的安定，对稳定蒙古、青海等地区的政治局势也有重要的影响。崇奉藏传佛教不仅可以绥服西藏，而且可以加强蒙古部对清王朝的向心力。《康熙时期藏传佛教与皇室信仰——兼论清圣祖对藏传佛教的态度》[3]一文探讨了康熙对于藏传佛教的态度。

《龙袍与袈裟：清宫藏传佛教文化考察》[4]一书从清宫藏传佛教神系发展的基本脉络、皇家佛堂内部神秘的众神世界、以乾隆时期为代表的藏传佛教绘画和造像的状况、艺术风格及重要作品等方面，全面揭示了清宫藏传佛教的基本面貌和主要特点，是清代宫廷史研究的一部力作。

《紫禁城风水》[5]中第八章对紫禁城的镇宅灵符进行了探讨，太和殿是紫禁城的大朝正殿，其镇宅灵符亦是整个紫禁城的镇宅灵符。根据《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中的记载，现太和殿放置的镇宅灵符为雍正九年（1731 年）放置的，为佛道合一。藏传佛教在清朝时期发展兴盛，雍正信奉大威德，并依《大威德怖畏金刚尊佛仪轨全经》修行，同时力主三教合一，因此，佛道并行于宫中。大威德被清代帝王视为国家的守护神，是藏传佛教无上瑜伽部父续成就本尊及文殊菩萨化身，《大威德八字秘密心陀罗尼》刻于符镇正面，也正说明了雍正对于藏传佛教之尊崇，反映了藏传佛教在清代雍正时期的发展状况。

（五）清宫相关藏传佛教历史重要人物研究

藏传佛教在宫廷的发展，以清朝为盛，其中乾隆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以对乾隆和藏传佛教的关系研究为中心，在研究清朝的民族政策、民族关系和宗教政策等方面有重要成果。

《仙楼佛堂与乾隆的“养心”、“养性”》[6]根据清宫档案所记和佛堂原状陈设，在理清仙楼佛堂的来源基础上，从养性殿仙楼佛堂里的乾隆御笔诗入手，与佛堂供奉主题相结合，阐明乾隆所追求的人生境界，可见藏传佛教对乾隆影响之深。养心殿仙楼佛堂位以五方佛为中心的唐卡供奉是为了实现乾隆所追求的无量圣界，《养心殿仙楼佛堂及唐卡析》[7]一文在档案记载的基础上，结合陈设原状与佛经，进一步阐释了仙楼佛堂所供奉的无量寿宝塔之意味，认为是佛教经典《妙吉祥平等秘密最上观门大教王经》修行的正果，乾隆建仙楼佛堂之

1 王家鹏：《汉藏交融 清代佛像艺术的主旋律》，《收藏家》2007 年第 12 期。
2 王子林：《清代宫廷藏传佛教殿堂与佛事》，《法源》2008 年第 26 期。
3 罗文华：《康熙时期藏传佛教与皇室信仰——兼论清圣祖对藏传佛教的态度》，《明清论丛》2009 年第九辑。
4 罗文华：《龙袍与袈裟 · 清宫藏传佛教文化考察》，紫禁城出版社，2005 年。
5 王子林：《紫禁城风水》，紫禁城出版社，2005 年。
6 王子林：《仙楼佛堂与乾隆的“养心”、“养性”》，《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 年第 4 期。
7 王子林：《养心殿仙楼佛堂及唐卡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 年第 3 期。

本意便是在于修成无良圣界。《佛堂伴君侧，闻清净妙香 —— 养心殿仙楼佛堂原装陈设》[1] 一文记载了其原状陈设。《乾隆帝与清宫的藏传佛教》[2] 探讨了乾隆与藏传佛教的关系，揭示了具有政治家与佛教徒双重身份的乾隆皇帝一方面推行理性的政治策略，同时追求理想化的宗教信仰。关于乾隆的藏传佛教信仰，研究成果众多。乾隆与三世章嘉关系密切，《开塔曾闻演法华 梵经宣教率章嘉——乾隆与三世章嘉活佛的师友情》[3] 一文结合史实记述了乾隆与三世章嘉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藏传佛教密宗修行注重师徒传承，灌顶是进入密宗修行的第一步。乾隆崇信藏传佛教，根据《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的记载，乾隆接受了章嘉国师的灌顶，乾隆接受灌顶的地点一直未得到研究证实。《乾隆于中正殿灌顶考》[4] 以章嘉传记所记末依据，根据档案记载，分析考证了乾隆接受灌顶的时间、地点、时机等问题，认为中正殿便是乾隆接受灌顶的地方。《乾隆与文殊菩萨——梵宗楼供奉陈设探析》[5]《如日照耀的功德之光——供奉于梵宗楼的乾隆帝御用盔甲》[6] 通过清宫档案，分析了梵宗楼佛堂的供奉特点，重点论述了梵宗楼所供文殊菩萨及大威德。乾隆被西藏黄教首领尊称为“文殊菩萨大皇帝”，乾隆若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大威德便是其忿怒相。梵宗楼供奉大威德是把大威德作为一尊威猛的战神奉祀，以震慑、消灭敌人，大威德被提升为国家的护佑神。梵宗楼第二层为大威德专用佛堂，乾隆供奉大威德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实现国泰民安的理想。乾隆不只是为了控制蒙藏地区的政治目的才推崇藏传佛教，他也虔诚地信奉藏传佛教，因此，官员大臣常进贡佛像。在故宫的佛像藏品中，保存了驻藏大臣留保柱进献的 11 尊佛像，其中有印度风格造像 4 尊，尼泊尔风格造像 3 尊，克什米尔风格造像 2 尊，西藏风格造像 2 尊，以印度和尼泊尔风格的早期造像为主。《留保柱献佛》[7] 记述了驻藏大臣留保住通过一次次进献佛像获得了乾隆的宽恕。王微《乾隆裕陵棺椁藏文经咒释读》[8] 重点对乾隆裕陵内所存棺椁上的藏文经咒进行了释读，作者试图通过此项研究，找到清代皇帝棺椁上所刻藏文经咒的基本内容及其宗教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清帝对于藏传佛教信仰的真实历史情况。此文在分析乾隆裕陵棺椁的藏文经咒基础上得出结论，认为乾隆大力推崇藏传佛教的原因，除了政治需要之外，亦有极大的原因是他本人对藏传佛教的信奉和尊崇。通过这些研究论述，几乎可以确认除了民族和政治政策之外，乾隆本人对藏传佛教确实十分尊崇。

清王朝积极巩固西藏边疆，进一步加强中央对西藏事务的直接管理，有效的实行了扶持和利用藏传佛教的政策，协调了民族关系，巩固了边防，保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使西藏与祖国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更为紧密。对历史上重要宗教领袖的研究是宫廷藏传佛教研究的重要一部分。清代历史上共有两位达赖、一位班禅进京朝见皇帝，这三位格鲁派领袖朝见皇帝的时间恰好在清王朝早中晚三个历史阶段，在皇宫中留下许多文物，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重要素材。《故宫中的西藏佛教艺术瑰宝（二）——六世班禅大师在北

1 王子林：《佛堂伴君侧闻清净妙香——养心殿仙楼佛堂的原状陈设》，《紫禁城》2006 年第 7 期。
2 冯印淙：《乾隆帝与清宫的藏传佛教》，《故宫博物院八十华诞暨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2005 年。
3 文明：《开塔曾闻演法华 梵经宣教率章嘉——乾隆与三世章嘉活佛的师友情》，《紫禁城》2006 年第 4 期。
4 王子林：《乾隆于中正殿灌顶考》，《法源》2006 年第 24 期。
5 王子林：《乾隆与文殊菩萨——梵宗楼供奉陈设探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 年第 4 期。
6 王子林：《如日照耀的功德之光——供奉于梵宗楼的乾隆帝御用盔甲》，《紫禁城》2007 年第 11 期。
7 马云华：《留保柱献佛》，《紫禁城》2006 年。
8 王微：《乾隆裕陵棺椁藏文经咒释读》，《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 年第 1 期。

京的纪念》[1]一文记述了故宫博物院现存关于六世班禅之文物：画像、奏书、马鞍及影堂，通过还原这一朝觐过程，可见清朝对西藏的民族方针策略。

章嘉活佛原是青海五大活佛系统之一，自康熙朝之后，历代章嘉活佛作为国师，在清朝管理藏传佛教及治理蒙藏地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三世章嘉（1717 ～ 1786 年），因其在历史上的重要贡献以及与乾隆的密切关系，亦是研究之重点。章嘉·若必多吉在宫廷任职五十余年，参与解决了诸多民族、宗教问题，辅佐清廷治理蒙藏地方，为民族团结做出了巨大贡献，以藏传佛教为媒介在汉藏两地搭建了交流的桥梁，促进了藏汉文化的交流融合。《一代国师章嘉若必多吉》[2]论述了其生平及重要地位。《三世章嘉与他的护法神》[3]对三世章嘉及其护法神进行了探究。

六世班禅和三世章嘉为边疆的安定和藏传佛教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二人于北京圆寂后，乾隆皇帝为他们建造了影堂以作纪念。雨花阁东西配楼分别为三世章嘉及六世班禅的影堂，供奉二人的画像及有关纪念物。此举措不仅有助于加强藏蒙地区与中央政府的联系，同时也是乾隆个人感情因素的反映。《六世班禅与三世章嘉影堂考实》[4]一文通过对影堂这一独特建筑形式的考察，结合档案对其陈设进行了分析考证。

（六）田野考察与学术合作

近二十年来，故宫藏传佛教研究在充分利用馆藏资源基础上，在藏传佛教艺术史和宫廷佛教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但并没有固步自封，而是不断开拓了与国内、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

田野考察方面，2005 年 6 ～ 7 月，故宫博物院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康巴地区民族考古综合考察团，对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重要的文物和主要的文化点进行综合考察，之后发表《四川甘孜地区民族与考古综合考察综述》[5]《四川甘孜州丹巴县中路乡藏传佛教经堂碉壁画的时代与风格》[6]《四川石渠县松格嘛呢石经城调查简报》[7]，出版了《四川甘孜地区民族与考古调查报告：木雅地区明代藏传佛教经堂碉壁画》[8]。2008 年 8 月 1 日至 28 日，故宫博物院与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甘肃省永登县鲁土司衙门博物馆研究人员组成联合考察队，对妙因寺、显教寺、感恩寺和雷坛四处鲁土司属寺进行了考察，对属寺现存的所有文物的图像资料进行了全面采集和初步整理，这些既是研究明清美术史、明清宗教史重要的第一手材料，也是明清时期汉藏文化交流的直接证明，无论在佛教领域还是在美术史领域都有着较高的研究价值，发表《甘肃永登连城鲁土司属寺考察报告》[9]。

西藏文物保护方面，先后开展西藏夏鲁寺、大昭寺、贡嘎曲德寺等寺庙的文物保护项目，更深入地参与

1 王家鹏：《故宫中的西藏佛教艺术瑰宝（二）——六世班禅大师在北京的纪念》，《中国西藏》，2002 年第 1 期。

2 王家鹏：《故宫中的藏传佛教艺术瑰宝（三）——一代国师章嘉若必多吉》，《中国西藏》（中文版），2002 年第 2 期。

3 王子林：《三世章嘉与他的护法神》，《紫禁城》2003 年第 2 期。

4 王子林：《六世班禅与三世章嘉影堂考实》，《法源》，2007 年。

5 罗文华：《四川甘孜地区民族与考古综合考察综述》，《故宫学刊》2005 年第 2 辑。

6 谢继胜、罗文华、石岩刚：《汉藏佛教美术研究 第四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

7 罗文华、姚军：《四川石渠县松格嘛呢石经城调查简报》，《文物》2006 年第 2 期。

8 罗文华：故宫博物院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甘孜地区民族与考古调查报告：木雅地区明代藏传佛教经堂碉壁画》，故宫出版社，2013 年。

9 罗文华、文明：《甘肃永登连城鲁土司属寺考察报告》，《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 年第 1 期。

到了西藏本土藏传佛教文物的调查研究和保护工作中。

学术研究方面，参与组织了两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并成立了故宫藏传佛教研究中心。

在以故宫资源为基础进行研究之外，故宫博物院研究人员将目光放到更广阔的平台上，关注藏传佛教研究中的重点，亦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学术论文包括《布达拉宫金铜佛像精粹》[1]《拉萨西藏博物馆绰丝不动金刚唐卡之断代》[2]《清代高道娄近垣事迹考述》[3]《杜齐（G.Tucci）的余音：来自罗马的藏传佛教研究信息》[4]《游僧的灵感——冯·施罗德对十世噶玛巴却英多杰铜造像的发现与研究评介》[5]等。

故宫博物院罗文华研究员参与出版《汉藏佛教美术研究》[6]一书，此书出版之际融合了国际西藏考古和艺术研究的最新成果，研究范围综合了藏、汉、西夏、蒙古、东巴等各民族古代绘画、雕塑、建筑、纺织印染等各个方面，内容丰富，综合性强。以及《藏传佛教艺术发展史》[7]一书，此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现了从7世纪至18世纪藏传佛教艺术的瑰丽画卷，是国内第一部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藏传佛教艺术通史性著作，填补了藏传佛教艺术研究的一项空白，代表了中国学者在此领域研究的最高水准。

四　研究前景及展望

故宫博物院近二十年以来，在藏传佛教研究领域，以馆藏文物为基础，尤其是清宫藏传佛教文化探索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并积极与国内外大学、研究所、考古所等机构合作，进行田野考察、考古发掘、文物保护、资料整理等，拓展了学术视野，扩大了研究领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并立足于更广阔的平台，着眼于当前藏传佛教研究热点及难点，积极参与和推动了藏传佛教文化的研究和保护。今后的发展方向为：

1. 夯实研究基础。加强对于故宫藏品、佛堂原状和藏文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如有可能，尽快开设梵藏文专业阅读培训课程，提高梵藏文一手文献的研读能力。

2. 扩大田野调查。密切与四川、甘肃、青海、西藏、云南等藏文化圈内文博考古单位的合作，加强对于这些地区寺庙建筑、壁画、藏品的资料收集和研究。未来还需要加强北京地区藏传佛教文物的调查和研究。

3. 加强与国内外学术机构的合作与交流，定期开展学术信息交流、学术课题合作研究、出版、学术讲座、学者往来等活动。有计划翻译出版一批重要的梵藏文基础资料文献、日本与西方的学术著作，扩大学术视野，同时，定期组织专题学术会议，提高故宫藏传佛教文物研究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宫廷部藏传佛教研究中心］

1　王家鹏：《布达拉宫金铜佛像精萃》，《中国西藏》（中文版）2001 年第 2 期。

2　康百娜：《拉萨西藏博物馆绰丝不动金刚唐卡之断代》，《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 年第 5 期。

3　罗文华：《清代高道娄近垣事迹考述》，《贤者新宴——王尧先生八秩华诞藏学论文集》，2010 年。

4　罗文华：《杜齐（G.Tucci）的余音：来自罗马的藏传佛教研究信息》，《故宫学术讲谈录》第一辑，2010 年。

5　罗文华：《游僧的灵感——冯·施罗德对十世噶玛巴却英多杰铜造像的发现与研究评介》，《中国书画》2004 年第 6 期。

6　谢继胜、罗文华：《汉藏佛教美术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

7　谢继胜、罗文华、熊文彬：《藏传佛教艺术发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